

書 評

Reviews

《意境論的形成——唐代意境論研究》，黃景進著，臺北：臺灣學生書局，二〇〇四年。10+二五五頁。

李豐楙，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研究員

黃景進教授所專長的研究課題是中國古典詩文論，在完成本書之前既已累積了相關的文學批評研究成果，除單篇論文〈唐代意境論〉以外，特別撰有兩本專著：《王漁洋詩論之研究》(1980)、《嚴羽及其詩論之研究》(1986)，都以專家詩論為主。新著《意境論的形成》，有一副標題「唐代意境論研究」，基本上之所以會標明時代的斷限，即由唐前至唐代王昌齡(694?-756)、皎然(720-?)至權德輿(759-818)、劉禹錫(772-842)、司空圖(837-908)等，以所擅長的專家詩論為研究對象，貫時性的探討唐代意境論的形成過程；乃因為原本的出版計畫中，唐代以後是由楊玉成負責，共同寫成一本「意境」的研究，黃著既獨立成書，楊著即撰成另一冊《意境論的發展》。這兩本書原屬於千禧年由十位教授合作進行，而黃教授本人擔任聯絡人的一個出版計畫：「中國文學批評十大概念專類研究」的術語叢刊。編撰叢刊的動機與目的，原擬由顏崑陽教授撰寫「導論」，後來改由龔鵬程在「總序」中清楚表明，臺灣在七十年代曾引發一次爭議：中國是否有現代意義下的「文學批評」？傳統文評是否只存在印象式批評？當時這一來自西洋文學、比較文學界的質疑問難，曾由顏元叔策編一套《西洋文學批評術語叢刊》，實質表現西洋文學在文學批評史上的精要之論。這時期中國文學界的有心之士面對這一術語運用上的論難，雖有反省之意卻乏實際因應之能；但歷經一、二十年來的成長、思索，這批學界的年輕俊秀終於有能力自己策編一套。黃教授

既聯絡了國內外的一時才俊，在時間許可下就率先示範操作，其出版計畫雖則延滯，但在二〇〇四年出版的這一本書，可視為這一構想下的一種先聲，接下來就是其他學者如何針對中國文學批評史上的重要術語持續發聲。

從策編這種叢刊的心理動機及其時代情境，就可以檢討這本示範之作：其優缺點為何？又如何形成？故所肯定的並非只是黃氏一人，而是一批出身於中文學界的有心人，這是傳統的中國文學學界如何掌握時代契機，在「現代詮釋」的風潮下想要完成一種學術的志業。若有缺點也是可以方便提醒持續黃氏之後的其他撰述者：如何在這一種經驗上精益求精，期待共同持續完成更臻完善的一套叢刊，也就是如何使這套叢刊的編撰體例更趨周備。這本十餘萬字的專論，在撰述的用心、用力上，實已遠逾於「術語叢刊」當初每冊八萬至十萬字的構想，若能立基於這種文學批評的術語疏解經驗再進而調整，將是華人學界在中國文學批評的研究上作一階段性的經驗總結。經由彼此之間相互交流、互動的對話機會，可以各取所長以補所短，這是完成一件共同的志業頗有意義的事。之所以說這是「時代契機」，乃因七十年代臺灣與中國大陸在研究經驗上仍是相互隔絕的，而大陸學界對於「意境」之類的傳統文學觀念，也是在文革之後才又重新振起研究之風，終於在八十年代形成所謂的「意境熱」。就因當前已能集合海峽兩岸學界之長，並能因應全球化之下的國際漢學之風，才更有條件進行這一世代的學術大業，也就是「時勢」之所趨方便造就了黃氏等人的撰述之功：其中雖有一己在才學上的功力表現，卻也體現了這一代學者為何能竟其全功的有力條件。

在二〇〇四年本書出版的同一時間，大陸學界同行王振復（1945-）與古風（1957-）針對意境研究曾有一場學術對話，由於古風在二〇〇一年底出版了《意境探微》，王氏雖評價其為精華之作，卻也在兩代之間針對其書展開一場學術上的商榷。當時所提出的四個問題其實都是意境研究上的關鍵：意象與意境、王昌齡的「詩有三境」說、意境與境界，以及意境理論的現代化、世界化¹。除了最後一個論題外，都是屬於意境論史上的歷史問題，也正是黃氏採用貫時性的歷史研究中試圖加以解明的。由於黃氏在諸多引述、回應的對話對象中，未及注意古風曾長時間投入意境的整理研究，也就未見回應這本二〇〇一年出版的專著；不過在〈前言〉中卻曾回應一九九〇年閻采平的意境研究「述要」。就在這

¹ 古風：《意境探微》（南昌：百花洲文藝出版社，2001年）；王振復：〈對《意境探微》一書的四點意見〉，《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2004年第5期，頁32-37；古風的回應：〈關於當前意境研究的幾個問題——答王振復兼與葉朗、王文生商榷〉，刊登在同期《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頁38-45。

種研究經驗的分類中，才自我定位其研究所屬的性質，乃是「意境理論的歷史形成過程」，也就是兼取「觀念史」與「文學批評史」兩種進路。因此從文學批評史、中國美學史的歷史觀點，黃氏之作雖則只是斷限至唐代而已，卻也在問題的思考上關顧全局（如〈前言〉、〈結論〉兩章），故已可回應、參與大陸學界這場二〇〇四年的精采對話。古氏曾宏觀評估大陸已持續了二十年之久的「意境熱」，也在九十年代提出頗具雄心的「意境學大綱」，據其估計大陸出版的意境專著至少已六部，更不提大小不一的單篇論述了²。只有在文學批評學界這樣熱烈的時代環境下，評價黃氏這本在臺灣出版的中國詩學、美學的研究，才可以從整體的國際漢學界給予較為恰當的學術定位。同一時間古氏回應王氏所提出問題的急切性，並非是個別問題，而是提醒臺灣、國際學界也需同樣關顧黃氏這一類研究，只有如此才能確定黃氏及未來出版的，可代表臺灣學界在文學批評研究史上的具體成果。

為何黃氏之作可以回應王、古二人兩個世代之間的論難？其中既是有關大陸學界感到興趣的課題，卻也是針對同一類的共同問題，學術界出現了「所見略同」的同行之見，在相關問題的提出及解決之道上，黃氏到底在主、客觀條件上有哪些優勢。該書的〈內容簡介〉上即會明白表示：中國古典文藝理論的深層結構中，「意境」與「境界」乃是兩個必須掌握的重要概念，如何才能進入問題的核心？書中正是從意境與境界觀念的形成史下手，才可以具體呈現其在「義涵」上的衍變。這種「呈現」早期如一九九四年陳謙豫、蕭榮華所編選的《意境、典型、比興編》，只是初步的資料彙編之類。而本書所要進一步「突破」的，就是在評估學界同行的努力成果之後，期許其所作能有優勝之處。可約為兩點：一是能與同一學術社群間進行對話、回應，他所遍閱的從通史、通論到專家專論（如研究王昌齡、皎然諸書），雖則間有遺漏，但已盡其所能地回應了學者同行之見；這是這類術語叢刊編撰上，所需義務回應的「綜合」之功，在書中並非只要表現一己之所見，也是在遵守這一學術行規的情況下試加總結。二是對於當前詩學、美學的研究想要進一步擴大視野，表面上在文學觀念上回應了三教義理，雖似時下流行的「文化研究」；但在實踐上本書並不輕易應用時下流行的西方理論、觀點，而是針對原典的資料詳加解讀論證，試圖在本土文化的文本、脈絡上，擴充資料論證以期有所「整合」，這是學術功底的具體表現。意境研究的學

² 古風：〈21世紀意境研究的基本走向〉，《貴州社會科學》2002年第5期，頁52-55、102。

者都有一個共識，就是如何從字源學上深入理解「境」的本義、衍生義，也關注如何正視文化史上儒、道、釋三家、三教的「會通」問題，而突破的關鍵所在就在如何付諸實踐。在這一難題上黃氏並不畏難也不避其難，而能妥善運用佛經數位化的檢索之便，在外來佛教的文化、概念如何「征服中國」（許理和 [Erik Jan Zürcher] 語）的思考上，針對學者已引或未引的諸多佛經，如《俱舍論》、《俱舍論記》等，細緻解讀文本後終於有所突破。但是更為難得的是本書也關注本土文化，如儒家、道家、道教中人及易學等的先行引發或同時回應，這一部分如詳析經學家孔穎達 (574-648) 所注意的境、象關係（《周易正義》），就比較清楚表明其重要性；而道教發展的重玄學，如詳析成玄英 (fl. 632-650) 的境論。闡述這類儒、道在境論上的創見，是一般意境研究中較少被凸顯的，由於書中反覆論證儒、道在「傳承」上早有洞燭之見，才使佛經能經由格義化，終能激發創意而深化了詩學、美學上的認識與體證，這是在會通三教的研究取向中，本書能夠不偏於一方而平實論證有所突破之處。

本書選擇「唐代」作為意境史研究上的分界點，不僅是因為資料上、問題上的錯綜複雜，而是從文化史理解「唐型文化」同樣會表現在類似意境的美學問題上。許理和針對佛教進入中國中古早期的「傳播」(spread) 與「適應」(adaptation)，總結以「征服」的強烈觀念³。這本名著的題名雖則可能引起漢文化民族主義者的刺眼之感，但實可平心靜氣地看待「如何」征服的過程，然後檢討「為何」被征服的原因。從這本論證意境中有關「境」的申論過程，就可以發現意境在觀念的形成、衍變中，正是具體表現佛經所引介進來的思想意識，就在「適應」的過程中既收編也被收編，這才是 adaptation 的雙面含意。在書中並非一味強調佛教在唯識的證知上如何征服中國，同時也一再凸顯本土的詩學、哲學（特別是易學與儒、道二家），如何在觀物的認識經驗上實已注意言與意、心與物、意與境的互應關係。書中大費篇幅從陸機 (261-303)、劉勰 (465-520) 到唐代論詩諸家的理論轉折，瑣細援引以闡述佛、道的虛靜、禪觀的心性修行，與儒家經學所受的激發，乃是本書用力最深也是問題最為錯綜複雜處，這一部分最不易讀，卻也是最具創意處。大陸學界一般多會提出「天人合一」作為哲學基礎，而本書也一再使用「感應」作為感物論的認知基礎，以之表明本土文化作為詩學的根柢。但是本書之所以能超越之前的同類著作，就在於能靈活運用佛教，並及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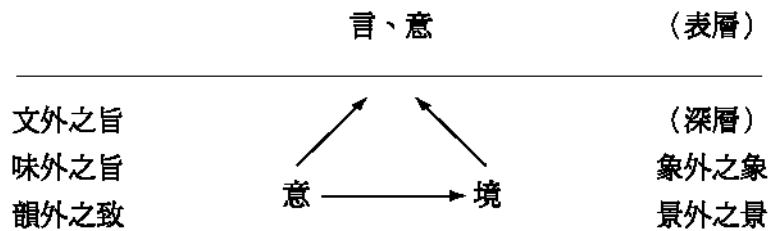
³ Erick Jan Zürcher, *The Buddhist Conquest of China: The Spread and Adaptation of Buddhism in Early Medieval China* (Leiden: E. J. Brill, 1959)。已有李四龍、裴勇等中文譯本：《佛教征服中國：佛教在中國中古早期的傳播與適應》（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3年）。

道教的經典（非僅道家），從其中如何認識世界的宗教義理，進而導出如何啓發文學、美學上的觀物方式，就在移轉、借用中擴大、充實了中國文學批評上的認知經驗。在這一瑣細的研究中，對於六根與境、意與境的關係多能提出超越相關著作的觀念，其用力既深用心也切的，就是例證說明一個個關鍵詞：這一情況同樣也可提醒同行在深究「情性」、「格調」或「神韻」之類的術語群，均不能想要輕易跨越佛教這座研究上的障礙，勢需從佛經、道經中梳理出相關的語言、思維方式，否則就是仍在原地上腳躄不前！其實這也提醒中文學門之治思想、觀念史者，若要深入研究這種認「識」方式的衍變，只將佛教、道教視為「宗教」而不能認真面對其在文化上的具體貢獻，終究無法從根本上解決問題！所以從文化史可以提出一個觀念，魏晉南北朝在宗教上的突破，也造就了文化上的「突破」，從這部研究意象轉變為意境的詩學觀念中就可以獲致明證。

基本上對於意境所作的歷史研究仍是一個詩學、美學上的問題，縱使靈活運用了佛教在觀物、識境上的知識、證驗，也同樣會面臨一個詮釋上的問題。黃氏在本書的論證過程中，廣泛運用相關的資料，特別是今人的研究成果；但是為了能夠為現代人所「接受」，其實就在語言、觀念上進行了「現代詮釋」。這種詮釋就是以文學理論作為共同的基礎，有一個章節安排上的問題，就是為何在書中沒有開宗明義就直接表明其據以詮釋的基本理念；而是假設從事詩學、美學研究者已有語言、觀念上的共識，也就是訓練愈札實則在文學原理的認識上也就愈準確。黃氏並不急於表明其為「作品中心論」或「作者中心論」，以免一開始就陷入文學理論上的糾纏；而是實際面對意境觀念上的發展，直接就古籍中所用的文本解讀，再置於歷史文化脈絡中清理出一條主線：「作者」與「讀者」的問題也就出現在不同文論中，其定位幾乎緊扣著意與境的關係隨時提醒，這就關涉書中用以詮釋的「語言」。一般習慣西方各種理論、觀念者，常會對於傳統文論中的語言表示不同意見：如單字的言、意、物、境，或感應、感物等複詞，到底在現代詮釋下應該如何理解？特別是與「境」複合的辭彙：王昌齡論「造境」、「三境」，皎然論「取境」，司空圖提出「思與境偕」，都是困難的觀念問題；有關物境、情境、意境的「三境」，古風在所著與回應中比較偏於「詩體意識」，認為是與「山水詩」、「抒情詩」、「哲理詩」有關的三種「形態」；而王振復則從三種「品格」（或層次）作解，認為物境僅是形似之境，其品最低；而「情境」從「佛教否定情欲」的層次言仍是沾染、繫縛於情，仍是不高；只有「意境」靜虛、空靈的「天地之境」，最被王昌齡推崇。古、王兩人在詮釋

上是否各得真解抑是「誤讀」？同一問題黃氏在書中先說明「照境」正是要仔細觀察「境物形象」，以取得理想、適合的物象，事物成爲一個境，表示具有某些特徵，自成一個範圍而區別於其他事物，這是遵守「境」在本義上的範圍意、區別意。在這種認知下，物境只是一「理想的山水景物」，與山水文學有關而已；而「情境」是「抒發人的各種情感爲主」，並未被明確解爲「抒情詩」；而「意境」最難理解，故出之以疑似語氣說：「可能是指一種表達事物義理的詩。」(p. 156) 物、情、意三字所指的，從傳承關係言，「物色」之境之觀念來自六朝，本身並不較其優劣，而王振復則以佛理解之；古氏所指實的山水詩、抒情詩或哲理詩，也都是今人所認知的詩體觀；黃氏在書中則從六朝發展到唐代的歷史關係理解，說明三境「可能是針對境句而言」，並不一定就是三種「詩境」。相較之下這是比較審慎的解讀，在詮釋古籍上的語言、觀念，現代人如何適度的詮釋的確是一個分寸拿捏的關鍵。

對於意境原理的解說，基本上既與「作者」的創作有關，也與「讀者」的閱讀經驗有關，到底要如何表達這些關鍵字的關係，黃氏嘗試使用了圖表法。這是西方文學批評界常用的方便法，圖雖簡卻可便於說解，其實這也是一種理論模型。黃氏以所製的一個「三角圖形」爲例，用以綜合說明從王昌齡、皎然到司空圖的詩論旨趣，也就是從早期意與象的契合，經皎然的象下之意而到象外之象，用以方便說明王昌齡、皎然、劉禹錫等較爲重視「詩境中所寄寓的情感或思想意義」，而司空圖則進一步強調「詩境中的美感性質」，此中亦兼含作者觀點與讀者觀點於一。在本書中使用「表層」言、意與「深層」意、境，作爲意境論的基本結構 (p. 218)：



這種嘗試是否能爲學界所同意仍不可知，但對於理解意境論確有一定的幫助，代表了這一代理解意境觀念所持的「演進」觀點。書中先綜論六朝諸家文論中與「境」有關者，然後爲了解決意象論如何轉變爲意境論，指出各家各有所

取，於王昌齡詩論中取立意、照境、用思，於皎然則取作用、象下之意與取境，而於中晚唐則專論其發展：「意與境會」→「思與境偕」、「境生象外」→「象外之象」，認為這是意境論史上的完成階段。其論證過程既吸取回應了學界諸說，卻也在諸關鍵處以佛、道及儒之理加以深化，由於書中所引證的資料繁多，論證過程亦頗繁複，乃是本書閱讀上最為艱難的部分，也是作者所要辛苦突破的要點所在。所以結論時才又針對「境」字在整個觀念史上與「意境」義的關係，據其所使用的語境與架構，綜合出文評史上所出現的不同用法，避免各照一隅而狹窄化了意境之說；同時也連帶引起思考與情景說、境界說等的關係，這是本術語叢刊之間需要彼此照應的緣故。

黃氏對於這本術語叢刊之作，雖則常在引述諸家後自謙只是「補充」或「擴大」，或將大力解說的佛教、道教以及儒家經學諸說，認為可免後之作者重覆檢索、考察之勞，其實言下仍有一種自許、自得之意，這也是學界熟知意境研究史者應予以肯定的。不過在他用力頗勤的搜求群書中，雖已用心但仍有遺珠之憾，如古風之作；又由於不作專節的研究史回顧而採取隨文附註方式，就不易讓讀是書者一時完整掌握其對話的對象。作為一種術語叢刊的功能，本身既有綜合之功也有創發之見，故在此建議：最好能階段性地綜述所有的研究成果，以示一個階段的總評；至少需附上完備的研究書目與重要術語分類索引，在數位化時代這並非難事。實可借此表現每一本專著的作者，如何借由術語分類以示其關注重點所在，這是叢刊所不可或缺的。其次討論文學批評的理論層次較高，並不易一翻即可掌握，為了便於翻檢，故建議章節中仍需多列小「目」或次目，以醒理論依次開展的眉目，這兩個都只是技術性的編撰體例問題。

重要的是作為一種文學術語的綜論性讀物，仍需為學界提出一些共同的期許，一是例證說明：唐人選詩摘句以此為其專長，可方便理解當時人的範詩、範句典型；而今人則多喜作理論性的闡釋。黃氏在結論時才舉〈商山早行〉為例，建議在補強闡述各家論點時以當時所舉的詩例解說，可解說唐人論詩的趣味所在，否則以論解論常有循環論證之嫌。二是整合闡述：在書中有關書畫藝術，最後才作為附錄而聊備於後，建議整合不同的學科而擴充藝術範疇，也以時代先後比較彼此之間的交互影響關係，這一點可方便理解不同藝術間的美感經驗，以之作為往後諸書的撰述理想。三是術語解說或圖表：現代的文學批評在體系建構與語言運用上，其流弊自是流於硬套，但也不能否認在語言、觀念上的「現代化」；也就是「西洋化」的學理分析，所涉及的學科凡有多門，想避也無從完

全避免：諸如書中習見的感覺、美感或感應、情感，到底只是一般意義上的習慣用法，抑是具有心理學、文藝心理學意義上的用語？都可就佛經文字、詩話文字分別在本文或附註中說明，這是望之似易而實則不易的基本功。四則是體系建構：這部分黃氏頗為警覺，常在文中視情況而指明。既然不在〈緒論〉一開始就出現，以免套用之嫌、或讓讀者有先入為主之偏，在此建議可在〈結論〉中作一完整的綜合說明，到底「意境」在作者論、讀者論之間的關係為何？或是偏於作者的作品中心的創作，抑或讀者但據作品反映宇宙？這一文學論上的根本問題，其實也正是評價「意境」論的基本準據，應在總結時作一清楚的解說。五是比較理論：黃氏雖則自我定位為貫時性的歷史研究，但在解說如何用以理解歷代詩（自上古到唐代），卻仍不免涉及詩學理論上的比較。如何在不套用現代或西方理論的情況下，卻又可與現代人的知識經驗或語言思維作比較？這是未來建立中國文學批評術語及其體系，幾乎是不可避免之路。由本書之完成可以期許其有更深進一層的研究「境界」！從王夢鷗先生早年在《文學概論》中提出「境界」的討論，其後的文論探索也都是嘗試梳理中國人的詩學觀念，這是開創的階段；如今又有黃教授完成一個階段性的定鼎之作，如此就彰顯臺灣在文學批評界的「傳承」與「創新」中，其中所顯示的意義，自是譜系昭然，而又在成果上有「過於師」之處。若是王先生地下有知，恐怕也會有「方堪傳授」之識見吧！

Bringing the World Home: Appropriating the West in Late Qing and Early Republican China. By Theodore Hutters.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5. Pp. ix + 370.

Jing TSU (石靜遠), Assistant Professor, Yale University

Though the preoccupation with defining modern China in relation to the West has been a thriving academic and historical practice, few contemporary scholars can provide a range of analysis as broad and masterful as Theodore Hutters in his new book, *Bringing the World Home: Appropriating the West in Late Qing and Early Republican China*. In many ways, this synthesis is long overdue. Given the wide attention given to the late Qing period in the past twenty years by literary scholars in Japan and China and, increasingly, United States, the fact that we are yet to have a coherent perspective on the rich complexity of this period testifies to its bewildering literary and cultural landscape. The important works of Tsurumoto Teruo 樽本照雄, Guo Yanli 郭延禮, Chen Pingyuan 陳平原, Patrick Hanan, and David Der-wei Wang 王德威 have set the